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

RESEARCH ON CITIZENSHIP IDENTITY

张翠梅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成果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

RESEARCH ON CITIZENSHIP IDENTITY

张翠梅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 / 张翠梅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20-4858-9

I. ①公… II. ①张… III. ①公民-研究 IV. ①D0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5223号

- 书 名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
GONGMIN SHENFEN RENTONG YANJIU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academic.press@hotmail.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58908437(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720mm×960mm 16 开本 14.750 印张 240 千字
- 版 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858-9/D·4818
- 定 价 45.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司法部 2009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
青年项目（09SFB3001）结题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对公民身份的脉络梳理与性质认定	22
一、公民身份的脉络梳理	22
二、公民身份的概念解析	31
三、公民身份的性质认定	39
第二章 认同何种公民身份	45
一、何谓认同	45
二、认同何种公民身份——公民美德的解读	49
三、公民文化的塑造——生活世界中的礼仪	72
第三章 如何认同（一）——政府责任伦理诉求	76
一、为什么首先要谈政治制度	76
二、政府的功能与姿态	79
三、治理模式选择	91
第四章 如何认同（二）——公民参与与自治	116
一、公民参与是必需的吗？	116

二、公民参与的总体分析	118
三、公民参与的场域分析	125
四、公民参与的角色分析	137
五、私域与自治	142
第五章 如何认同（三）——公民教育	150
一、为什么开宗明义是价值多元主义	150
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52
三、公民教育纲领	163
第六章 全球化场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	178
一、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认同	179
二、文化多元主义与公民身份认同	184
三、权利话语与公民身份认同	185
四、现代性与公民身份认同	188
五、转型中国的地方性生活图景	192
第七章 纷争与立场	197
一、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还是共和主义	197
二、解构，重构抑或超越	205
结 语	214
参考文献	216
后 记	228

绪论

这是个错位和不确定的世界，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

——吉登斯

一个人如何才能过得好，怎样使得一个人过的是好的生活？这仍然是我致力于探讨和深究的问题。以往关注于“分配正义原则和再分配政策的恰当与否”这样类似于普适性的正义法则和社会结构，但路径依赖的共存与相伴使得这种努力徒劳。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正义理论能够在现代社会里赢得一致的共识。这使得我开始寻求制度外的救赎，转而探寻“人”——这一制度承载主体的塑造与定位问题，继而关注公民的身份和资格，包括他们的权利、责任与德行，关注话语权和共同体的包容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正义理论的需要，或者说可以作为制度正义理论的必要补充，再或者，更进一步地讲，这应当是制度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必要条件。^{〔1〕}

一、文化进路与文化资本

（一）文化的自觉对于人的自我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是在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个体和社会活动的“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2〕}，而“生

〔1〕 虽然有的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性退却，实际上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本身也存在众多分歧。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73页。

〔2〕 衣俊卿：“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存方式的改变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1〕。文化看起来似乎身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之外，又似乎是其附属，但实际上却逻辑性地优先于它们，并且暗含着政治、经济等一切社会存在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社会的流动和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一直以一种未自觉的方式主宰着整个社会进程和话语实践。它是动态的，因为“文本只有在社会关系和互动关系中才能被激活，才有意义”〔2〕。所以，要理解一种社会实践的价值，首先要理解我们的文化所赋予它的意义。事实上，恰恰是文化场域里多元的、差异的甚至对抗的元素之间较量的过程完成了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发挥影响，它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社会整合受益于文化认同。不但如此，不同文化模式的对抗或新旧文化精神的冲突直接制约着社会转型的进程，文化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人就是文化的存在。只有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才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视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视界回归。但是，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意识到其生存的文化内涵。事实上，文化作为人的“第二本性”所包含的人本规定性使人不再像动物那样完全凭借本能自在地生存，而是获得了一个自由和创造性的空间。〔3〕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为基础，然后寻求改变世界的手段和实践。

（二）文化资本

资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概念，代表着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生产因素的存储能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产生的效益。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始于社会学之父孔德，他在《社会政体体制》的第二章里提出，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代代积累的资本会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从资本能够自身增值的角度看，文化的运用就是精神生产过程，通过这种抽象劳动实现价值转移，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使自身增值。〔4〕作为社会群体实践方

〔1〕 衣俊卿：“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演进思路”，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

〔2〕 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反权力话语研究”，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博士论文2002年，第137页。

〔3〕 参见衣俊卿：“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4〕 在《理解布迪厄》一书中，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譬如在教育场域里，是一种构成文化资本的学术资历。”显然，我这里并没有使用布迪厄概念中具有特殊指涉的含义，换句话说，公民身份并不是布迪厄意义下的文化资本。

式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包容性，其传播与交流可以推动文化资本的变迁，即在识别、萃取、吸纳、接受，甚至包括抵抗、冲突的文化碰撞过程中，文化实现了发展与变革，而文化资本在批判、清理、整合与创新之中得到了扬弃和升华。韦伯曾断言，中国的现代化转变缺乏某种深层的文化动力，而现代化过程中又往往需要内在地伴随一种文化精神作为巨大的支撑力。这样，重塑新型主体人格，建构新的文化范式，重新累积文化资本，引导和推动社会走向新的规范整合，就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三）“文化公民身份”范式的选择与确定

关于公民身份的研究，目前比较经典的范式包括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片面强调“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致使人的主体力量与文化因素受到忽视和遮蔽。工具理性转变成了终极目的，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人的物化在所难免，实际上，技术科学没有实现普遍性的事业，却加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进程。本书拟采用“文化公民身份”范式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以及政治价值等。文化模式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影响和制约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不仅仅如此，人们能够就其生活目标做出自主的选择，选择的能力依赖于文化背景的存在，因此个人自由依赖于个人在文化社区中的成员资格，所以，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文化成员资格是自主的道德选择的前提，影响着个人的地位感和自尊感，在文化背景中实施的行为“被赋予额外的意义”〔1〕。

一个人的文化决定着想象力的界限，因此如果他的文化能够给予他的选择减少，那么相应地他的自主性也会减少，文化身份在促进个人自由或自主时担当角色。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它无法进入现实社会的文化市场流通，但却可以在政治文明生成过程中具有文化资本的价值属性。它作为一种基于公民身份和行为的一系列观念、态度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成员的归属、权利和义务。显然，共同体成员资格和个人认同是现代公民角色的文化属性，处

〔1〕 难以忘记我国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法国传递奥运火炬时遇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参见 <http://torchrelay.beijing2008.cn/cn/torchbearers/headlines/jinjing/>，访问日期：2012年3月5日。

于相同文化社群中的人们彼此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而恰恰是这些东西规定了他们的文化成员身份，民族性、共同的价值标准、神话和象征、集体记忆和传统、共同的语言^[1]等被当作是公民身份的基础。文化公民身份意味着极大的散播性和自反性，它是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更进一步地讲，对公民身份的文化解读还包括对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文化和教育理念进行多元化的修正。这里不是简单的兼容并蓄，或者如交互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所言，把文化当作一种合成物，通过相互作用、批判性选择和挪用，即拼凑，使不同成分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形式，而是把文化视为一种活生生的过程，在解释与认同中完成“反思性均衡”。这样，虽然从制度上看，公民身份的所指范围通常有抽象的法律定义和标示，但显然公民身份的涵义不仅仅如此。我们需要超越马歇尔曾经划定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一三维体系，正如布莱恩·S. 特纳、莫里斯·罗奇和史蒂文森所关注的那样，我们更多的视野落脚到文化权利上。换句话说，公民问题的讨论要转换到“生活政治”中来，更多地探讨一般性认识的建构方式，更全面地评价、解释冲突和符号多义性问题。

这里还需说明的是，文化公民身份最初被看作是有效地、创造性地和成功地参与民族文化的权利，这种文化成员资格主要表现为拥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其中，个体拥有一种原生（naive）的成员身份。但近期，大众文化、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营造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确认公民身份概念必须建立在确保个体化人格得到尊重的基础上，如史蒂文森在《文化与公民身份》一书中关注文化传统与文化冲突，威尔·金里卡在《多元公民身份》一书中强调公民权与生俱来地具有群体分殊性，因此证成移民文化权利的正当性，等等。^[2]本书的研究重点与上述皆有不同，即并没有专注于权利话语内部，挖掘文化权利之所在，而是更关注论证伦理学层面上义务的正当性，这一点将在全书中贯穿与显现。

二、风险与危机——对当下社会的表象描述

“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

[1]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设定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界限”。

[2] See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4.

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1〕当社会系统结构无法承载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它并不源自环境的突变，而是因为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同样的系统发生改变，既可以说是系统的学习和转型，也可以说是系统的瓦解和崩溃。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传统断裂是社会系统崩溃的一个标志，因为传统断裂导致了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丧失了其社会整合的力量。传统主义的基础被剥夺，意识形态的核心被质疑，以及公民、家庭、职业的私人性受到威胁，都是危机倾向的可能表现。在这样的前提认知下，我们对当下社会做一表象描述。

（一）制度性危机

2011年9月，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2〕，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社会不公、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以及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强烈不满，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声称“已经对支持傲慢、腐败、集权的官僚感到恶心和厌倦”，希望再度获得决定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权，依靠常识和生活智慧来做出关键性的选择。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繁荣，却体验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无力感。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使大规模生产、消费及物质满足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观念并被普遍化，致使产生了一大群充满物欲激情，但与他人隔绝，不再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也不再需求其他可替代生活方式的人，但留给他们的还是“模糊不清的境域，漂泊不定的不满足感，非理性的行为模式等，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们无法认定是什么的挫折感和苦恼境遇”〔3〕。

代议民主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公民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其公民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现代政治实践却表现出进一步异化启蒙政治理念的态势，造成“个体越来越淡漠于公民的意识，政治则越来越以个体为

〔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页。

〔2〕 参见 <http://www.huanqiu.com/zhuanti/world/mgzhlhej/>，访问日期：2012年11月5日。

〔3〕 Raymond Geuss,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1.

手段的结果”〔1〕。又如加藤节所说，现代政治越来越“意味着一种倒置状态的出现，即本来作为人类行为的政治，已经变成了人类不仅无法控制反而被其压倒的力量”〔2〕。这种背离和颠倒体现在官僚制的肆虐发展和政治冷淡的扩大等诸多方面。这验证了韦伯最初的预言，官僚制虽然带来了规范运作的高效率，却因只具备形式合理性但缺失了价值合理性而成为了囚禁所有个体的铁笼。不但如此，当代社会的高度政治化致使政治权力浸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户籍、税收、档案等载体，对个体生活起基础性组织作用；同时，通过个体的医疗、教育、生育、婚姻、社会保障，使个体对政治权力极度依赖；更极致的状态如福柯所言，通过规训、纪律约束、思想教育等手段，使个体成为驯服的肉体。还远远不只如此，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两极对峙，近几年的中东危机、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使我们看到了政治悖谬的可怕。个体越来越满足于自己的个人生活与消费欲望，越来越没有精力与能力进行政治想象与参与，“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3〕。反之，由政府提供满足人们私人生活的手段，只有少数人愿意去积极参与自治，这样受到威胁的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尊严，并有可能产生自由的失落，继而产生托克维尔所说的软性专制（soft despotism）——以民主的形式，家长风格的监护式治理。这同样存在着异化的风险和可能。此处关键在于，如哈贝马斯所述，体系是否脱离了以理解为基本方式，以达成共识为基本目的的交往理性的价值追求，脱离交往理性就很可能对生活世界造成干预、限制和危害。

（二）智识性危机

首先，工具理性所造就的现代化大厦出现危机。现代化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本身导致了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目的之间的冲突和张力，20世纪以来显现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清楚地说明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存在悖论。“轴心期”所确立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正面临着危机

〔1〕 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2〕 [日] 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

和挑战。^{〔1〕}现代工业文明在取得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环境恶化、世界大战、极权主义、政治危机、意义丧失等无不意味着现代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现代社会展开了反思和批判。正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又或者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加 = 奴役的扩展”，其造成社会失序，冲突加剧，个人同一性缺失，社会化进程受阻等现象。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而是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体系的官僚化和金钱化的趋向等造成的。^{〔2〕}工具理性的优先导致了目标的遮蔽，产生了泰勒所担忧的“意义的失落”，我们的关键是要“考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工具理性是否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起比现在更少的作用。”^{〔3〕}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被质疑造成严重的信仰缺失和整体性泯灭。新儒学、新威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感到无法掌握话语的全部，整体感在默默地远离人们的视野。”^{〔4〕}而在我国，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和试错机制的形成，意识形态逐渐丧失了社会整合功能，传统上由儒学道统或社会主义道德所型塑的文化认同同样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资产阶级自我主义变成了普遍性功利主义的世俗伦理，本身脱离了自然法的论证语境，成为一种无争议的常识，道德观点也就当然脱离了理论的解释系统。各种世界观认知意义的日益贫乏，使道德变得越发形式化，并失去了各种有意义的解释。

最后，系统整合无力解决身份认同，致使出现社会反常状态。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社会包括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共识形成机制达致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与以金钱（经济系统）和权力（行政系统）为导控媒介达致的系统整合（systemic integration）两个方面。现在，系统整合与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发生的社会整合处于彼此竞争的关系之中。改革开放后，官方意识形态与公民认同之间的隔膜，致使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渐丧

〔1〕 参见衣俊卿：“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2〕 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3〕 See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 8.

〔4〕 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博士论文2004年，第147页。

失，而主要依靠系统整合，特别是行政系统以权力为媒介勉力完成。在具有细致的劳动分工、极端异质性和根本利益冲突的现阶段，世界已分裂为无数原子式的个体和群体的碎片。当统一的集体的行动基础开始削弱时，社会结构倾向于解体，并产生了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反常状态。个体的存在不再植根于稳定和完整的社会环境之中，生命活动的很大部分失去了意义和含义，认同再次受到怀疑。从最亲密的个人关系到全球政治系统过程，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围绕着矛盾性和偶然性建构起来。社会整合被描绘成标准化（如福柯所言）、市场诱惑和享乐主义刺激（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混合体。

冷战后至今，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用贝克的话说，当代社会是以不确定性、风险和意外不断增加的语境中的自反性个体决策为特征的。当代文化一旦被剥去了传统，被所有险恶的全球风险所伤害，就会使个体决策和个人进取心变得很激进。在一个商品化的多项选择、工具理性、基因技术、化学技术和核科技的年代，对社会生活的保护却正在消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保护的社会里。作为一种虚拟的现实而存在的风险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吉登斯也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不同形态的资本积累体制、新的政府理性、阶级的重构、新的国际治理体制等等都在胶着中，而显现模糊。社会科学似乎已无法再承担起世界观的功能。如果维护世界的解释系统今天已无可挽回地属于过去，那么又由谁来完成建构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道德实践任务呢？〔1〕如何在政治、道德和宗教多元并存、相互争斗的情势下，重建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统一呢？这已经成了我们当下最急需解决的深刻命题。

（三）对当下中国的一个简单扫描

目光回到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处在整体性发展和结构性变动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基调下显现出不均衡性、多元性和不可逆性。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和市场双重启动，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双向运动〔2〕，原有的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转化为市场主导型的城

〔1〕 参见〔英〕尼克·史蒂文森主编：《文化与公民身份》，陈志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31~132页。

〔2〕 参见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乡二元结构。多种过渡状态并存，同时呈现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多元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大体上可视为社会合理化进程的展开，遵循形式合理性的官僚体制和法律制度得以确立，为传统儒学“重义轻利”观念所不容、类似于韦伯新教伦理的“事功精神”开始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追求。^{〔1〕}物质主义、利润至上、数量崇拜和增长狂热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弥漫在整个以现代技术为特征的大众社会之上的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健全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道德滑坡和信仰缺失，生产经营人的唯利性被充分诱发出来，诸如三鹿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电视娱乐节目《非诚勿扰》中，“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观；权力腐化、公德失范、职业道德缺失、家庭伦理的衰落；奉献精神衰退，传统社群的瓦解，社会信任的丧失，都伴之以享乐主义的滋长、精神信仰的空虚，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众多的社会病理，并阻碍了人们的反思能力。

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发端于对西方理性精神本能的排斥和抵抗。处于后发和赶超状态的中国，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成长条件，而不得不在较短的时间里同时解决稳定、效率、福利和公平等重大问题。社会转型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尤其伴随着社会的分化重组，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正当化压力。“在政治生活领域，官僚集团无处不在的腐败激发起大众的强烈不满，由此滋生出底层对上层、民众对官僚的绝望心态和普遍愤怒；在经济生活领域内，民众的需求型消费和新富阶层、官僚集团的欲望型消费的对立，则再明白不过标识出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之下，却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2〕}从法治的程度来看，民主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但仅仅表现在制度建设层面，比如立法的速度和数量上，却与法律权威形成较大的反差。公众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进而强化了顺从的、充满奴性、压抑的依附人格。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实现了重大的社会转型，但也促发了文化断裂，而由于历史等因素导致的公民性缺失，致使文化断裂背景下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和社会失范等现象加剧。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进行公民性塑造，从而为

〔1〕 参见孙国东：“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构建中国新型的政治文化提供根本性支撑。

三、研究的意义与预期目标

(一) 研究的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与国内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使得国家——社会维度下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问题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

1. 公民身份之于社会资本的累积。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和组织通过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利所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中，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处于这种交流结构中的某些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这种财富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本。”〔1〕它是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是社会系统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的资源，其组成成分之一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其结构就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为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在社会资本中，制度社会资本是最宏观的层面，包括社会的制度、政体、政治环境、民众心理以及治理的质量等，这些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结构设计、运作效率和发展程度。”〔2〕而公民们之间信任的积累，即“彼此同情地视对方为共同的风险承担者，并在共同的计划中合作，而不陷溺于犬儒主义、孤立和搭便车的心思之中”〔3〕，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生活中更有价值的东西是善意、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互动。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

〔1〕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经常被人们引用为由社会结构导致的资源；科尔曼（Colema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产生优势利益的社会结构的功能；帕特南（Robert Putnam）则集中讨论了社会结构所促进的行动，通过促进合作提高效率。此处很难讲运用的是谁的定义。一个基本认同的观点是，社会资本就是一种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2〕 李劲：“社会转型视域下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位论文2008年，第114页。

〔3〕 [英] 恩勒·伊辛、布莱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能够解决公民共同体的集体行动问题。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资源，网络越密的公民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合作。公民精神的养成利于实现社会自治功能，增强社会信任度。和谐社会需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需要人们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而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诸如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可减少成本，在市场背景下可建立更多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如信任、合作和诚实等；同时，志愿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推动公民之间合作，并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1]。所以，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产生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反过来又有助于更有效的政治秩序的运行。

2. 公民身份对于政治参与的意义。主体缺乏参与热情，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会断绝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这时，即便是开明的统治者也无法获取足够的社会信息与社会资本。能否容忍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与之一起工作；是否愿意参与政治进程，以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政治当局负起责任；是否愿意表现出自我克制并履行自己的责任；是否有正义感和诚信遵守社会契约，这些公民个体的政治美德和基本道德修养是确保制度规范普遍、持续发挥规范约束作用和高效运行的主体条件。制度本身的选择、设计、安排和操作需要具备正当合理性，但同时也需要制度操作者和制度约束对象的政治美德或公民美德。显然，“社会”和“公民美德”都是一种政治伦理资源，甚至都是一种政治的善。

市场经济形成了具有世俗化、个体化特点的政治文化类型。如若社会成员都从个人的角度策划行动方式的话，那就不会有和谐的存在余地，人们难免会跌落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去。公民文化中内在蕴含的参与性精神调和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使和谐成为可能。处于公民文化氛围中的主体会积极地将自身意愿融进政治制度模式中，监督乃至积极参与政治运行。利益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暴动、游行、信访、找领导、走后门等，而成熟、健康的公民社会会以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

[1] 参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